



《近世文史随笔选粹丛书》

庸庵随笔

（清）薛福成著 邓亦兵编选、校点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

庸庵随笔

■ (清) 薛福成 著 邓亦兵 编选、校点 ■

主 编 姜纬堂 李 乔

近世文史随笔选粹丛书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庸庵随笔/(清)薛福成著;邓亦兵编选、校点. —北京: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, 1998.3

(近世文史随笔选粹丛书/姜纬堂, 李乔主编)

ISBN 7-5035-1647-X

I. 庸… II. ①薛… ②邓… III.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清代-选集 IV. I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9419 号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)

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0.625

字数:195 千字 印数:1—8000 册

定价:16.00 元

责任编辑：王 杰

版式设计：任志珍

责任校对：邓亦兵

封面设计：孙超英

《近世文史随笔选粹丛书》

书 目

甘 霖 随 笔

指 严 随 笔

庸 庵 随 笔

淮 生 随 笔

南 亭 随 笔

仲 可 随 笔

穰 卿 随 笔

霞 外 随 笔

《近世文史随笔选粹丛书》前言

尽管“随笔”一词，迟至南宋·洪迈《容斋随笔》方才出现，并用为书名，但这种体裁却古已有之，先秦诸子著作中的许多篇章，其实就是后世所谓之“随笔”。非只此也，就连号为经典的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，又何尝不是后世所谓的“随笔”？

为什么随笔一体如此源远流长，虽历数千年，迄为著述家与读者所钟爱？

说来，其因不外：

一是随笔之“散”。所谓“散”，系相对于历史上曾代兴之“韵文”（如楚辞、汉赋之类）、“骈文”（即所谓“四六文”）等而言。因其属于“散文”，故无固定之程式和法则，执笔者可享充分之自由，无所拘束，“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”，且其形式一般不为时代风尚所左右。

二是随笔之“随”。即主题不限，内容不拘，可庄、可谐、可大、可小，随所感、所闻、所见，皆得直抒胸臆，信笔书之，若话家常。不必有系统，更无须顾及全书之结构，即使是“东一榔头，西一棒锤”，亦不致见

讥于人，谓非著述之体。

三是随笔之“短”。凡号为随笔者，篇幅皆有限，一般均以简明扼要取胜，既便阅读，又利于内容之浓缩。以同等篇幅论，则“随笔”读来省时，且所包含之信息量相对为大，为丰，使读者得事半功倍之效，获开卷有益之实惠。

四是随笔之“松”。随笔所含，较少庄严凝重之内容，其题材多相对轻松活泼，或属人生之体味，或属故典之探究，或属社会之新闻，或属闻人之逸事，或属谈诗论文，或属研艺述珍……总之，一般多具趣味，分别以哲理性、知识性，予读者以多层面之启发，既有裨见闻，亦足资谈助。无艰于阅读之劳苦，有品味高尚之收获。犹之轻音乐之可令人愉悦、放松，享消闲遣兴之乐。

这散、随、短、松四字，既为随笔之长，相对亦为其短。散，或致缺乏义蕴、文采；随，或流为冗琐丛脞；短，或易偏而难全；松，或失诸肤浅庸俗。“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”。惟在执笔者之善于驾驭。名家与恶道、杰出与庸俗，亦由而别之。实例具在，不必深论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：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，和世代著述家的努力，“随笔”这块园地已是流派纷呈，争奇斗妍。

有的侧重于议论感悟，有的侧重于掌故珍闻，有的侧重于谈文论艺，有的侧重于搜奇列异，有的侧重于抒发感情，有的侧重于研究学术，有的侧重于描绘故事，

有的兼而有之……此系就内容而言。至于在写法上，或致力于艺术渲染，或致力于本色写实，或致力于单线白描，或致力于浓墨重采，或综而合之……亦各有独到。

这种不同风格与特色的形成，既基于著者之学养与情趣，更决于著者的造诣与功力。“孙猴、八戒，各有所爱”，读者尽可自择所尚，初不必有所轩轻。

说到这里，有必要解释一下“笔记”与“随笔”。脱开现代文艺学的范畴，就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，人们习称之“笔记”，当然属于“随笔”，但却不能等同于“随笔”。

盖“随笔”，即洪迈所谓“意之所之，随即记录，因其后先，无复詮次”者也，故其范围更宽，更广，除习称之“笔记”外，诸凡非专著性，而系零篇短什之野史、稗乘、书事、纪闻、传人、述感、序跋、题识、游记、日记、语录、书札等等，皆可归之于“随笔”。

本丛书之取名“随笔”，意在示其包罗对象不仅仅限于习称之“笔记”。

同理，本丛书所谓之“近世”，亦不尽同于习用作历史分期之“近代”。

今中国历史，以鸦片战争至“五四运动”为“近代”，“五四运动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“现代”；世界历史之分期，则非但说法各异，且无一与中国历史分期吻合者。本丛书仅取其相通者为参照，而用“近世”一词之古义，即《荀子·非相》篇所谓“远举则

病缪，近世则病佣”的“近世”，意谓去今不远之时世。

具体说，系指自清中叶即鸦片战争前数十年（十九世纪初），以迄 1949 年。如此划分的目的有二：一是想把鸦片战争前的社会、历史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背景包括进来；二是由于从鸦片战争到建国前，中国的社会性质其实并无本质的不同。

持此为范围，凡生活于其间之文史随笔作家，纪述其间事实之文史随笔作品，皆在搜罗与发掘之列。当然，其中之记述内容多有上及清初，甚或更早者，但须以记上述“近世”者为主；其中作家之生活年代，或有其生早于十九世纪初，或有其卒已为建国之后者，但其主要文史随笔著作的产生及其成名，则应系上述“近世”之事。

至于本丛书之于“随笔”前特冠“文史”二字，是想稍稍限定范围，即将专门属于美文、专门抒发情感、专门探讨哲理、专门从事议论、专门搜奇列异、专门研治“经学”的一些“随笔”除外，力避虚空、繁琐和过于艰深。

所收罗者，侧重习指之“文史”，即文化与历史，以掌故性、知识性和启发性，使读者于可读耐赏、广知博闻、明目醒脾之余，对近世文史随笔作家及其著作有所认识与了解，聊充深入探究之津逮。

丛书名称中之“选粹”二字，既体现了编辑的宗旨，也标明了编辑的方法。

“选粹”者，择其精华也，撷其纲要也，提供读者以经过挑剔、加工之精神食粮也。近世文史随笔著作虽然相当丰富，但内容亦颇驳杂、参差。本丛书既定位于一般文史爱好者和有兴趣于广知博闻，汲取有益之精神营养的读者，而非专门研究者，自然不必无别优劣，不分精华与糟粕地全文照印，徒费读者的宝贵时间和本可他用的纸墨。因而，“选粹”便成为必要。

且惟有“选粹”，方符“批判地继承”旧时精神产品的正确方针；惟有“选粹”才能更好地实现“便于读者认识近世历史文化社会，了解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，鉴往励今，推进两个文明建设”的编辑宗旨。

选粹，包含了两层含义：一是在众多作家中“选粹”，一是在该家众多作品中“选粹”。也就是把优秀作家和他的优秀作品发掘出来，经过加工，贡献于读者。虽系尝鼎一脔，但足可由而略窥全盘。

其间，在每辑所收八家中，适当注意不同流派、不同风格、不同时期作家的搭配，以免单调。由于限定每位作家一册，故其随笔著作之总篇幅未超过二十万字，致无“选粹”余地者，则只好割爱。

具体操作中，则根据诸家作品的实际，以“四性”、“六不取”为原则。

四性，谓知识性、趣味性、科学性、史料性。

六不取为：过于深奥，为今日一般读者所隔膜者，不取；攻击、污蔑、歪曲农民起义者，不取；丑化、歧

视兄弟民族者，不取；宣扬宗教、迷信者，不取；低级趣味或格调不高者，不取；与时代潮流、现行政令抵触（如宣扬早婚、纳妾、多子多福、嘲诋火葬之类）者，不取。

需加说明的是“六不取”所指为内容主旨，非指个别词句。若称农民起义为“匪”、“逆”之类，不必因有此类词句而概弃之，相信读者自会鉴别。余可类推。

至于因时代与阶级地位限制，在观察的准确，立论的允当，记述的严谨方面，原文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欠缺，自然未可苛求，于此不必细说。

由于近世文史随笔著作，多采用比较浅显的近世文言文，用繁体字，或无标点，或仅有断句，且在称谓习惯、书写格式等方面，亦与今不尽相同，不便今日一般读者阅读，加之所据底本，难免抄印之讹误，所以必作相应之加工。但这加工，非谓修改或删节原文，而系在保存原文的基础上进行。

具体包括十二项：

一、校订文字，对原本抄写、刊印之讹误，在理由充分、证据确凿的情况下，采取径改法，不另说明；对属于疑似之间，无确切把握者，则姑仍其旧，不擅为更动。原文中以□□□隐去其名者，一律仍旧，个别无从辨识之字，亦以墨框示之。

二、改为简化字，统一异体字，加现行标点符号，横排。

三、凡于兄弟民族名称加“犬”旁之类，意存污辱者，统回改为该兄弟民族之本称。

四、除原无条目标题者，概为新拟条目外，原有者亦视情况，或保留，或重拟，并于导言中说明。

五、对行文中使用字、号、别署，以及以谥为称、以籍为称、以爵为称、以官为称者，统于新拟标题中列出该人之姓名。

六、对因未取其前之具名条，而所选条又中脱姓、脱名、脱年号、脱地名者，一律补于文中之相关部位，并附〔 〕以别之。

七、原文中之小字夹注，则改为同号楷体字，加（ ）以别之。个别或仅以不同字体区别之。

八、原文过长者，酌为分段。或撷取其中有关部分，单独立条。惟均保持原文完整，中不删节。

九、每册依内容性质，或依来源，分为若干类，并拟类目；类下之条文，依符合逻辑之原则排列，不尽依原书。

十、每条末，注明来源、出处，以便复按。个别或取统一说明法，不一一具列。

十一、书首统加以《×××（该书著者）和他的随笔》为题之导读专文，介绍著者及其随笔，说明选编中之有关事项。

十二、书末统附有关该著者的碑传资料，及其随笔著作的叙录资料。

如此加工的目的只有一个：便于读者的阅读与了解，尽量减少阅读与了解的“拦路虎”。

因系经过抉择、加工之新编，故统以该作家之字、号，后赘“随笔”二字为各该册之书名。计划以每辑八册，分辑陆续编印。

尽管旨在为读者献上一套经过选择与加工的雅俗共赏、品位高尚的文史读物，立意正大，将事认真，但是否符合读者口味，特别是上述选粹原则与加工方法之是否有当，均有待于读者来审查与鉴定。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不惮风险，勇于组织编印这套效益尚未敢必的丛书，尤足征其识见与魄力。作为选编者的我们，更殷切期望得到方家与读者的批评、指正。

1997年溽暑，姜纬堂谨识于京华两知二有之斋，时年花甲有二。

薛福成和他的随笔

姜 纬 堂

在中国近世历史上，作为继新思想家和外交活动家的薛福成，不仅以其识见明达，身体力行，站在时代前列，而且以其著述与事功，发挥了积极的影响，不愧为一代历史文化名人。

薛氏字叔耘，号庸庵，江苏省无锡县（今锡山市）人。道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（1838年4月12日）生。祖锦堂，秀才；父湘，官至广西潯州府知府；兄福辰，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。

福成三岁时，鸦片战争爆发，帝国主义侵略者以大炮轰开中国门户，闭关锁国的时代一去不返。当其十四岁时，太平天国爆发，并很快蔓延到他的家乡。福成间关战火，奉母避乱于江北之扬州府宝应县乡间，濒危者屡。直至其二十七岁时，这场动摇了清朝统治基础的烽火，始遭扑灭，而开所谓清朝“中兴”之局。

在内忧外患中成长起来的薛氏，虽自幼即读“儒先性理书”，“习制举业”，但眼见社会动荡，时变方殷，因而，更有志于“经世之学”，对形势发展，具深长之

思考，于国运时趋筹有自己之主张。他后来形诸文字的变法图强，实行君主立宪，发展民族资本等一系列有价值的思想，其实皆奠基于斯际。

别看他在制举之业上，并未通达，迟至同治六年（1867年）江南乡试，才考中副榜，连正式举人均未博得，只是一名副贡生。但他早已是一位明悉时局，洞彻形势，满腹经纶，足应时需的“新型”知识份子。

此前，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，曾国藩应诏北上“剿捻”，张榜郡县，罗致人才。时二十八岁，尚系秀才之薛氏，以万言书上，纵论“策富强，定经制，消反侧，防外侮，正风俗”之道，而对声势赫奕之曾氏殊多规勉，独无谀颂之词。由而使曾对其识见、品格，大为激赏，延入幕府，成为时所艳称之“曾门四贤”之一。曾故后，薛氏又于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，入李鸿章幕府，专掌笺奏。而在外交事务中，尤为李所倚畀。

倘说当初薛氏还只是怀有维新思想，那么，在他先后从曾、从李的幕府生涯中，其维新思想与擘画，则不但益加成熟，且有不少得假曾、李而付诸实践。虽多属因人成事，但却不乏意义深远之举，如洞悉列强关系，以折威妥玛之要素；巧用借口，而阻赫德之谋我海防控制权；促成迅速出兵朝鲜，以杜日本之染指；等等，实皆有功于国家与民族，久为人所称道。

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，薛氏出任浙江宁绍台道。适当中法战争发生，沿海戒严。台湾告急，福州丧师，诸

多特派大员失机辱国。独浙江因薛氏总理营务，妥为经画，得与敌相持数十日，防守严固，不为所乘。世叹为难，益知其非仅因人成事之幕府才。

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九月，擢湖南按察使。次年四月，赏二品顶戴，以三品京堂候补，充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。十六年（1890年）正月，由沪附轮放洋，次月抵法履新。

清代之派遣驻英使节，始于光绪元年；派遣驻法使节，始于光绪四年，例以驻英使节兼任（个别有例外）；驻义（意大利），始于光绪七年，先均由驻德使节兼，自福成之前任刘瑞芬，始由驻英、法使节兼；驻比，始于光绪十一年，先亦由驻德使节兼，自刘瑞芬始改。

故所谓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，实始于光绪十一年，薛福成为其第二任。至光绪二十一年专派驻法使节，二十八年又专派驻义使节、驻比使节，所谓出使英法义比三国大臣亦成历史。故薛福成又为最后一任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。

出使期间，薛氏承早期当局者不谙外务，多失国权之余，细心调查研究，妥善因应折冲，颇多建树。如奏请废除“通海”旧禁，以安华侨之归国者；不憚交涉，据理力争，终使英国承认我有权在香港设领事；至于在南洋群岛设领事，以保护华侨权益，则尤为其所刻意经营；在与英交涉中缅勘界过程中，善于把握时机，讲求策略，取得较旧议为佳的结果，分得汉龙等四关及昔

马、科干、车里、孟连诸地，甚有裨于云南边防。

在国势孱弱，外交屡屡失机，诸多被动的情况下，薛氏发挥主观能动性，勇于任事，不惜自找麻烦，力争国权，爱国热情炽盛，称得上不辱使命，较诸当时不少颟顸误国之外交人员，洵属尽心尽职之凤毛麟角，因被推为有贡献之使才。其间，其官衔亦由三品京堂候补，而授光禄寺卿，转太常寺卿，改大理寺卿，再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实授二品顶戴。

光绪二十年四月，任满，卸职内渡。甫抵上海，遽以疾歿于六月十九日（1894年7月21日），终年五十七岁。天不假年，致其才未得充份展布，论者惜之。

薛氏自早岁起即留心时务，后更通过所上《治平六策》等一系列建议，明确阐述其维新变法，救时济艰之主张。出使期间，更游历欧洲诸国，亲见资本主义文明，于西方政俗、风物，体认尤深，维新思想益形深化。生平又善文词，勤撰述，积极通过著作来宣传其主张，留下了相当丰富的精神财富。在近世国人从“开眼看世界”到“走向世界”期间，所形成的一系列文化遗产中，薛氏非仅以其文笔优胜，洞达事理著称，而且以其深刻性、实历性，别具特色，曾经影响了一代读者。

其业已流布之著作有：《庸庵文编》四卷、《庸庵文续编》二卷、《庸庵文外编》四卷、《庸庵海外文编》四卷、《庸庵文别集》六卷、《庸庵笔记》六卷、《筹洋刍议》一卷、《浙东筹防录》四卷、《出使四国奏疏》二

卷、《出使四国公牍》十卷、《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》六卷、《出使日记续刻》十卷。此外，尚有《幕府古文书牍》、《东西洋地志稿》、《西轺日知录》等，未流布。

本书为薛氏随笔之选编。主要取材于《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》（光绪十八年上海鸿宝斋石印本）和《庸庵笔记》（光绪二十三年遗经楼校刊本）。

《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》，始光绪十六年正月首途，至次年二月，除个别因“并无见闻，亦无新义”，而略去一、两日外，余皆排日记述，而以关系洋务、时局者为限断。“述事之外，务恢新义，兼网旧闻，凡瀛环之形势、西学之源流，洋情之变幻、军械之更新，思议所及”，皆随手札记。故不仅是单纯的见闻录，更包括了作者的感想、见解与思考。其中，尤致意于中国积弱之故、富强之道的探讨，中西文化、政俗之比较。

《庸庵笔记》，则为其自同治四年至光绪十七年，凡二十七年间见闻随笔之删存。“虽不过随时涉笔，而所以挽回世道人心者，未尝不兢兢焉”。所记，既“有裨经世之学”，复“务求奄奄独造，不拾前人牙慧”。计分“史料”、“轶闻”、“述异”、“幽怪”四门，记录了不少晚清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的实情，和许多颇有趣味之遗闻轶事。其中，“史料”一门，涉笔谨严，尤具价值，向为研究晚清史事者所重视。

除上举二作外，为反映薛氏作为维新思想家之面目，复酌选《筹洋刍议》（光绪二十三年上海醉六堂石